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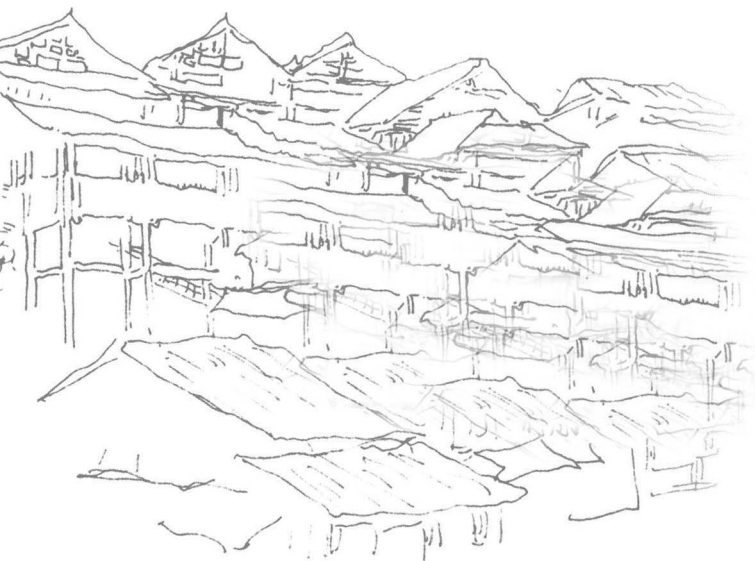
贵州少数民族文艺 审美意识研究

周帆等著

民族出版社

贵州少数民族文艺 审美意识研究

周帆等著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贵州少数民族文艺审美意识研究/周帆等著. —北京:民族出版社, 2010. 5

ISBN 978 - 7 - 105 - 10777 - 3

I. ①贵… II. ①周… III. ①少数民族—文艺美学—研究—贵州省 IV. ①I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87134 号

责任编辑:姚启星

封面设计:金 晔

出版发行: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100013

网 址:<http://www.mzcsbs.com>

印 刷:北京迪鑫印刷厂印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版 次: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 数:350 千字

印 张:13.25

定 价:32.00 元

ISBN 978 - 7 - 105 - 10777 - 3/I · 2142 (汉 623)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编辑室电话:010 - 64212794

发行部电话:010 - 64224782

序

童庆炳

探究贵州少数民族文艺中蕴涵的审美意识，无疑是一个十分有意义和有价值的选题。在以经济利益为内趋力，受现代科技通讯手段推动的全球化趋势形成的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对边缘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国文化部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即是对这一热潮的回应。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将压力变为机遇，弘扬民族文化是时代的重要课题。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除汉族外还生活着苗族、侗族、布依族、土家族、彝族、瑶族、水族、仡佬族、回族、壮族、白族、畲族、毛南族、羌族、蒙古族、满族等 17 个民族。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使贵州各民族得以长期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具有丰富多彩的、体现鲜明而独特民族性的原生态文艺。这本书实际上是对贵州少数民族传统、血缘特质的张扬和呼唤，也是对全球化挑战的一个小小的回应。

作者提到：“本书肩负的使命是双重的，既要唤醒民族边缘文化的原始性、原创性、多样性和丰富的想象性特质，又要提炼一些真正能代表这些边缘民族文化特性的美学思想来，使其能够参与东方美学大厦的建构。”令人欣慰的是此书可说是基本上达到了目的。作者的研究思路是力图站在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民族

价值、情感、体验的立场上，从少数民族文艺中具有代表该民族特性的审美意识入手，来探究各个少数民族文艺中的独特审美意识是如何生成、显现、发展、传承的，以及各自固守其审美意识的方式和深刻机缘。全书选择了苗族、侗族、布依族、彝族、仡佬族等贵州五个少数民族作为研究对象。其间不乏深刻的、发人深思的启示。如在叙述侗族节日文化中的审美意识时，提出侗族节日活动的愉悦性、自由性、超越性特征与审美活动有着本质上的一致性，其间渗透着丰富的审美意蕴，这些审美意蕴皆指向以“和”为主导的审美理想，并从人与他者的和谐、审美时空的和谐、审美方式的和谐以及节日意义的和谐这四方面来描述“和”的显现，揭示“和”的本质在其反世俗化、反结构、凝聚天地人神、顺乎自然这四个方面，指出侗族节日中的“和”对族群生存发展的意义和作用。这一研究从少数民族文化的角度提供了中华民族关于“和”的思想的渊源和构成，在当今无疑有着重要意义。在侗族戏剧的研究中，不仅从其舒展柔缓的情节、趋向柔善的人物性格、母性孕育的柔情、女性主导的角色/演员、圆融舒缓的表演、回旋婉转的唱词和优美和缓的音乐七个方面，深入阐述了侗戏以柔美为主导的审美价值取向；而且从侗族宽容柔和的民族性格、侗歌与“锦”的艺术准备、汉戏的催发和天才式艺术家吴文彩的出现这四个条件来阐释侗戏的生成，以及侗戏的发展繁荣。侗族立足自身民族文化，勇敢地借鉴吸收汉族文化从而光大本民族文化的事例，为我们在全球化背景下两种文化发生碰撞与交融时弱势民族如何应对强势文化提供了一个可供借鉴的生动个案。在探究苗族文学中的审美意识时，把握塑造英雄形象是苗族文学的主题，英雄主义成为苗族文学的价值取向，英雄的情感成为苗族文学的主旋律，雄壮美是苗族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结合苗族在民族早期的创伤性经验，提出英雄情结是苗族民族性的体现。指出正是这种民族精神和审美心理支撑着灾难深重的

苗族人民承受住了巨大苦难，始终充满着顽强而旺盛的生命力。在论及彝族服饰中的审美意识时，认为彝族绚丽多姿、保持其强烈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特色的服饰，完整地凝聚着彝族人民千百年来形成的美学、宗教、政治、哲学及习俗等方面的传统观念，蕴含着彝族人民在文化结构深层的心理积淀。彝族是一个既崇拜火、虎这样危险可怕事物，又崇拜花这样温柔可爱事物的民族。这种极端的二重性，折射出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化心态。对于彝族人民来说，花是绚烂的，而虎是神圣的，火则既有绚烂的一面，又有神圣的一面。彝族的生活中，无处不是绚烂与神圣意识的交织。彝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正是二者的结合：即神圣而绚烂的美。绚烂是生命及感性世界，神圣是死亡及神灵世界；绚烂是娱神，神圣是自娱；绚烂是欲望，神圣是权威；绚烂是光明，神圣是黑夜。这种美的二重性互相依存、相得益彰，包涵着深刻丰富的文化内涵。另外，书中还饶有兴味地描述了苗歌的唱词结构与自然生态的完美应和，体现出心物感应的同构美，即唱词结构在外形上与某类植物的外形相似，排列得极像一株植物，彰显出神奇的艺术魅力；记叙了布依族仪式中朴素的审美意识；叙述了仡佬族苦难而漫长的失去家园、惨遭杀戮、被迫隐姓匿族、被迫与众多外来民族和谐相处的历史过程，及其审美文化中弥漫着的家园情结等等。

少数民族文艺审美意识的研究是一项艰难而复杂的工程，这本书可谓是一个初步的尝试。由于此研究涉及美学、民族学、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等多学科理论，因而存在一些局限性在所难免。比如在涉及一些理论问题时并未能真正走进这些学科的深处，因此，难免有一些章节的论述显得肤浅，一些问题的解决流于臆断。尽管有这些不足，但这本书的出版意味着少数民族文艺审美意识的研究迈进了一步，意味着在应对全球化的浪潮中增添了一朵小小的浪花。

本书作者身为一个师范学院的院长，不忘学习与研究，不断从学术上和精神上壮大自己，这是十分可喜的。我祝愿他和他的研究团队取得更大成绩。

2009年2月24日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英雄情结的瑰丽寄寓	
——苗族文学中的审美意识	(20)
第一节 英雄情结的生成与发展	(22)
第二节 英雄情结在苗族文学中的寄寓	(40)
第三节 苗族文学中的审美意识	(54)
第二章 诗性重复的悲慨之音	
——黔东南苗歌中的审美意识	(67)
第一节 黔东南苗歌概况	(68)
第二节 黔东南苗歌的审美特征	(76)
第三节 黔东南苗族民歌审美特征形成的原因	(98)
第三章 柔性之维的彰显	
——侗族戏剧中的审美意识	(112)
第一节 侗戏的生成、发展和繁荣	(112)
第二节 柔美之维的显现	(127)
第三节 柔性之维的探究	(159)

第四章 “和”之理想的显现与生成

- 侗族节日文化中的审美意识 (168)
- 第一节 “和”的显现 (171)
- 第二节 “和”的本质 (196)
- 第三节 “和”的生成 (209)

第五章 “朴素”生存中的戏仿

- 布依族仪式中的审美意识 (237)
- 第一节 布依族的仪式 (240)
- 第二节 朴素 布依族仪式中的审美意识 (251)
- 第三节 布依族仪式中朴素审美意识的成因分析 (276)

第六章 神圣而绚烂的美

- 彝族服饰中的审美意识 (285)
- 第一节 彝族服饰概貌及其功能 (287)
- 第二节 彝族服饰中所体现出的审美意识 (304)
- 第三节 彝族服饰审美意识的文化内涵分析 (320)

第七章 魂牵梦绕是“家园”

- 仡佬族文化中的家园情结及审美意识 (338)
- 第一节 仡佬族族源及其文化形态 (340)
- 第二节 仡佬族文化中的家园情结与审美意识 (358)
- 第三节 仡佬族家园情结形成的历史文化渊源 (384)

结 语 (399)

主要参考文献 (408)

后 记 (416)

导 论

本书的主旨是从贵州各民族原生态的文艺入手，探究其所蕴涵的审美意识。如果将各民族原生态文艺比作鸡蛋，乍看起来似乎大同小异，那么潜藏其中的审美意识则是其构成不同形态、制约并支配其发展的原初基因。因而研究少数民族文艺审美意识，不仅可破解其文艺形态异同的原因，缕出各民族文化对抗与融合关系的线索，还可挖掘出各民族共同心理素质形成的内在根据。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在全省 17.6 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除汉族外还生活着苗族、侗族、布依族、土家族、彝族、瑶族、水族、仡佬族、回族、壮族、白族、畲族、毛南族、羌族、蒙古族、满族等 17 个民族。贵州共有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等 3 个自治州，以及 11 个民族自治县和 400 多个民族乡，少数民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 39.7%。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背景使贵州各民族得以长期恪守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原生态文艺得以保存，并体现了鲜明而独特的民族性。

作为民族文艺审美意识研究，民族性的内涵自然是本书的立足点。关于此，不得不提到斯大林的著名论断：“民族（民族共同体）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形成于一定地域和经济基础之上，并且有特定共

同名称和明确的民族意识的长期稳定的文化语言共同体。”^① 美国历史学家海士认为，民族是指“凡使用相同或相似之语言，及遵守传统的共同的风俗习惯。并组成——或有意组成——有独特文化社会之人群。”那么，“民族性”应当是指某一民族所特有的民族意识和文化语言。费孝通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中认为：民族性是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按照英国学者安德森的论述，民族性是“一种特殊种类的文化制造物”。换言之，“民族性”来自人们对于特定民族的独特生活方式的“想象”，包含了人们的情感、幻想等。斯大林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或说为“结合成一个民族的人们在精神形态上的特点”，或说为“表现在民族文化特点上的精神形态”，同时他也使用“民族性格”这一术语。他认为民族共同心理素质会“在民族面貌上打上自己的烙印”。这个“烙印”实际上就是民族性。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梁启超，就曾在他的论史著作中涉及民族心理和民族意识问题。他认为，“民族成立之唯一的要素，在‘民族意识’之发现与确立。何谓民族意识？谓对他而自觉为我。”我国著名社会学家和民族学家费孝通，曾给共同心理素质下过界说，认为它是“同一民族的人感觉到大家是同属于一个人们共同体的自己人的这种心理”。费老还说，一个民族“总是要强调一些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生活方式上的特点，赋予强烈的感情，把它升华为代表这个民族的标志”。他还以我国仡佬族、苗族等民族为例，指出他们“感觉是同一民族的自己人”、“自觉是一个民族的心理十分显著”。简单来说，民族性就是一个民族自觉自己是一个民族的显著标志。因此，挖掘各民族审美的民族性在当今的意义十分重大。

^① 斯大林：《斯大林全集》（第 2 卷），294 页，人民出版社，1953。

民族性不仅是一个民族文化赖以立身和传承之本，更是在全球化语境下，对抗强势文化同化压力、争夺民族自身文化的生存空间、获得民族文化自身合法性地位和话语权的根本。后殖民主义批评家弗郎兹·法农曾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所遭受的破坏阻碍了它们按照自我种族的概念模式进行发展。当前“全球化”进程中遭受多重影响和破坏的少数民族文化正处于自身文化发展模式的艰难选择中。一方面是他者文化（The Other Culture）的全方位影响，让少数民族文化在对比中处于极端弱势的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在“文化多元主义”（Multiculturalism）、“少数者话语”（Minority Discourses）、“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等理论的支持下，少数民族文化内部崛起了强烈的文化自觉与自尊意识。这样，少数民族文化便宿命般地被置于某种“文化撕裂”和与之相伴的“文化疼痛”的遭遇中。文化撕裂与文化疼痛的最显著标志就是“文化身份”（Culture Identity）的模糊乃至丧失，以及与之相随的一系列与现实生存相关的“文化认同”（Culture Identification）问题。边缘性、地方性是少数民族文化的特点，也是其独特的学术研究价值之所在。西方学术界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注重对原始文化和异文化的研究。1986 年，詹姆逊在其《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三世界文学》一文中指出，在后现代文化条件下，西方心理学、美学、文化哲学的学术动力已面临枯竭，需要从第三世界国家的文化中寻找新的文化动因。1993 年佳·查·斯皮瓦克在《论艾柯》一文中认为，西方哲学、美学、心理学的自恋情结已走向极端，应当转向对东方文化的研究，以寻找文化发展的新模式。可见，对异文化和边缘文化的探索是学术发展和创新的重要动因。总之，以经济利益为内趋力，受现代科技通讯手段推动的全球化趋势，既是主流文化横行一时的辉煌时期，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世界性的对边缘文化研究的热潮。中国文化部的“民族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即是对

这一热潮的回应。本书以贵州少数民族文艺作为研究对象,以审美意识为切入点挖掘各民族的“民族性”,实际上是要使一个少数民族形成文化上的向心力,形成一种来自本民族传统,本民族血缘特质的呼唤。这种呼唤,不仅是少数民族文化自身身份认同的力量,而且对主流的文化具有警示、制衡的作用。希望借此为当前少数民族寻找自我身份认同提供参考,使少数民族文化可以参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平等对话,重建一种符合边缘文化与主流文化共存共生的话语空间。

同时,本书也是对“全球化语境中的东方美学将如何选择自己道路”这一深刻问题的一个重要探讨。在全球化语境下,东方美学要实现真正体现现代全体东方民族基本的文化信念和发展要求、形成特定的文化关怀能力,承担起为当代人类进行精神价值定位的责任、充分实现东西方美学的对话与互补,就不应该忽视对少数民族美学的关注和研究。贵州少数民族的美学思想和审美文化,深厚地积淀着民族文化精神,是中华美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各民族在彼此文化长期的影响交融过程中,形成了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中华美学特色。另一方面,就各个少数民族而言,他们的民族文化、民族心理乃至表现在美学理论和审美意识上,又各自具有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统一中的多样性。各民族各具特色的文化是人类文明、世界文化传承、发展的载体和基础。但如何将少数民族美学思想的光彩焕发出来,使其参与到整个东方美学大厦的重新建构中来,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文化相互影响的规律来看,强势文化总会影响到弱势文化,中华文化发展的总体思潮和趋势必然会影响少数民族文化的发展。民族文化中身份意识淡化乃至被遮蔽,恰恰是这种影响的负面效应。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华文化理当更加注重于发展自己的少数民族文化,注重于保持各少数民族文化的独立性、个性、民族性、民族特色,以构成丰富多彩

的、多元共存的文化图景，特别是要维护边缘文化的自身生存规律。

边缘并非是世界结束的地方，恰恰是世界阐明自身的地方。在其他语境中以沉默表现出来的边缘性，是一种具有无限魅力的光芒，是激发新的艺术激情和想像力的力量，昭示着某种全新的真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中具有精神思维上的原始性、原创性、多样性和丰富的想象性特征，其丰富性能够补足中原文化的缺失。正如杨义先生所说：“边缘的活力，对于中国文化的格局和生命力具有本质的意义。当中心文化发生僵化和失去创造力的时候，往往有一些形质特异的、创造力充溢的边缘文化或民间文化崛起，使中国文学开拓出新的时代文体和新的表现境界，从而在文化调整和重构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中华文明在世界上奇迹般绵延五千年而不断，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核心的凝聚作用之外，尚存在着生机勃勃的边缘文化的救济和补充，给它输入了一种充满活力的新鲜血液”^①“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精密的建构中趋于模式化，甚至僵化的时候，存在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边缘文化就对之发起新的挑战，注入一种为教条模式难以约束的原始活力和新鲜思维，使整个文明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重组和融合。可以这样说，中华文明之所以具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原创能力、兼容能力和经历数千年不堕不断的生命力，一方面是由于中原文化在领先进行精深创造的过程中，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另一方面是丰富的边缘文化在各自的生存环境中保存着、吸收着、转运着多姿多彩的激情、野性和灵气，这两个方面的综合，使中华文明成为一潭活水，一条奔流不息的江河，一个波澜壮阔的沧海。”^②而胡适在五四时期就是这

①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93～9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② 杨义：《重绘中国文学地图》，9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样看待边缘群体的：西南各省是中华民族新血液、新活力的来源。从这里看，本书肩负的使命是双重的，既要唤醒民族边缘文化的原始性、原创性、多样性和丰富的想象性特质，又要提炼一些真正能代表这些边缘民族文化特性的美学思想来，使其能够参与东方美学大厦的建构。于是，重新发现和重新认识少数民族的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使少数民族审美意识和审美文化获得“现代性”价值。中国美学的发展和创新，也需要从少数民族文化等边缘文化中寻找新的资源，以获得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古朴的少数民族艺术也是当代中国美学和艺术进行反思的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因为反思有赖于参照系的存在。例如关于近代中国现代性的反思，王东杰认为，这一反思有赖于两个“异文化体系”的存在：一个是处于华夏之外的，一个是处于华夏边缘的。只有在同时与这两个“他者”对话的过程中，华夏历史中那些被遮蔽了的面相才渐渐展示出来。对当代中国美学和艺术的反思，也需要在与上述两个异文化体系的交流、对话中进行。

另外，本书竭力挖掘出少数民族如何能恪守审美的生存方式的内在理念及机缘，为人类的生命本真存在的意义之思提供参考。确实，我们不得不惊奇的是少数民族那丰富完满的精神世界，其中宗教、神话、艺术和日常生存观念融成一体，正是这种奇妙的混合，竟成为其生存状态稳固的内在支撑力量，它构成了唯一内在地联合族群并让每一个体升华自身，允许每一个人分享无限与永恒的精神意义。这是处于物质充裕环境的现代人在感到失去生存终极意义的时刻应该钦慕的东西。关于这一点，巴雷特说得妙：“在世俗社会到来之前，宗教是一种涵养和抚慰人类生命的结构，给人类提供一整套可以让他表达精神整合向度的形象和象征，随着这个包容框架的失落，人不仅成为一无所有的存在，而且成为支离破碎的存在。”而在许多少数民族那里，艺术世界就是他们的宗教世界，他们通过

沉浸于艺术的享受与创造，在仰慕着更自由、美好的世界中得到心境的安宁。在艺术中，他们是真正感受到每个人都创造了自己的意义世界，这个意义世界是最独特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创造和发现，人的世界的丰富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在少数民族原生态的生存方式中，自我与外在世界的陌生感不仅得到克服，而且人感到自己从来都是而且一直都是与外在世界融为一体的完整存在。人与适合自身生存的地理及文化的圆周不是断裂的，而是延续的，因而人的生存意义也是完满自足的。

处在经济社会急剧变迁中的大多数人在关照自身时，却发现自身的支离破碎和外在陌生。正如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所谓：是什么促使我对待罗布里思人做调查的呢？是要发现他们的主要情感、行为动机和目的……他们的基本的、最深层的思维方式。这也就是为人的最初拥有而后又失却的完整性寻找最根本的证据。少数民族美学研究在现代所追求的正是——“人的自我回归”，是对现代社会人的“自我陌生”的一种必然发生的抗议。正如马克斯·舍勒在名为《人在宇宙中的地位》一书中所表达的思想：当人通过自我意识和世界意识，实现对自然的对象化，自然界印上了人的特有的精神标记，人也由此而成就人的本质。然而，一旦人把自己生成本身的行动从自然整体中提出来，并把自然变成自己的“对象”，他随即惊恐地转向自身并问道：“我自己在哪里？我的根据是什么？”因此，本书着重展示了少数民族中人与自我、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存现象，可以说他们的这种生存格局是一种真正的实现审美主体间性的生存。在许多少数民族那里，主体与世界的关系不是对立的主客关系，而是主体与主体的同一关系。世界由我们眼中死寂的、异己的客体变成他们眼中有生命的、亲近的另一个主体。两个主体之间相互尊重、彼此欣赏，以至于常常在文艺活动中融合为一体，达到主客合一、物我两忘的境界。由

此可以说，本书的研究在审美现代性的视角下也彰显出了一定的意义。

本书的研究思路是力图站在贵州各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语境和民族价值、情感、体验的立场上，从少数民族文艺中具有代表该民族特性的审美意识入手，来探究各个少数民族文艺中的独特审美意识，是如何生成、显现、发展、传承，并最终构成其民族性的，以及各自固守其审美意识的方式和深刻机缘。循此思想，本书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少数民族美学研究，为何以文艺作为研究对象？这里的少数民族是相对于汉族而言。由于少数民族美学处于相对落后的环境，保留更多的传统文化和原始痕迹，所以其往往处于弱势文化的状态且更具有民族性，更远离“世界性”、“现代性”、“全球化”带来的趋同性、共同性的缘故，能更清楚地表现出民族特点和个性。再者，选取民族文艺作为民族美学的视角，不仅是因为少数民族文艺更具有特点和个性，而且因为大多数少数民族没有本民族文字，而借助于口头文学和各种艺术形式来表达其审美需求，其民族文学的弱化和弱势，就必然造成民族艺术和口头文学的强化和优势。一般而言，少数民族往往依赖文艺形式来表达审美感情和审美需要，甚至来进行文化、教育、政治、宗教、伦理等活动，艺术和口头文学活动成为民族的主要活动形式之一和最主要的精神、文化、娱乐活动。同时，少数民族艺术确实因其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落后、交通不便、信息不畅、习俗积淀厚重等缘故，较好地保留了千百年来祖辈流传下来的古老艺术形式，并带有一定的原始性，除具有观赏、审美价值外，还具有研究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民族文艺是民族精神、心灵的最集中的表现，因而充分体现了民族性格、特点、精神、文化，也是民族凝聚力、向心力、民族团结的表现形式，是民族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形式。从民族文艺中表现出民族的审美特征、审美个性和审美趣味，从而也体现在民族文化和民